
书评季刊

孙鼎达

本期要目

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简评

- 法家学说之集大成——《韩非子》
- 问奇名山大川 探究自然奥秘——《徐霞客游记》

西方学术名著展评

-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
-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

现代书评

- 一部全新的教材——学《民族教育学通论》
- 评《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
- 评《拿破仑传》

名师访谈

- 情系民族 心系发展——马林教授访谈
- “记忆”教授——耿志教授访谈

2009

2

书评季刊

第六卷 第2期 (总第22期)

《书评季刊》编审委员会

主任：张英福

副主任：包和平 王秀文

成员：

李 鸿 段晓东 马 林 徐国凯 王培昌

姜国斌 刘勇奎 刘向东 马春东 王庆春

江 远 王立冬 谢 光 杜智殊 田 森

南文渊 刘江龙 王学艳 徐辑彦

主 编：包和平



法家学说之集大成

中国传统文化名著简评

——《韩非子》

◎包和平

《韩非子》是战国韩非等撰。韩非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 233 年。如果假定他的年龄小于荀子而与李斯相当，那么可以认为他约生于公元前 281 年。他是韩国的宗族公子，以国为氏，因而姓韩。韩非口吃，不擅言辞，但他擅长写文章。他曾和李斯是同学，共同向荀子学习，李斯自己承认不如韩非。韩非身处战国末期，兼并战争频繁，而韩国作为一个小国、弱国，处在一片内忧外患中。在外，韩国横遭强邻欺凌，国土日削，濒于危亡之际，韩国一直臣服于强秦，才得以苟延残喘；在内，韩国的朝政也混乱不堪，韩王极其暗弱昏乱，以至于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为重。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完全是一派“亡国之风”。面对这样的局面，韩非多次上书规劝韩王实行法治，但都未被采纳。当时有一个叫堂溪公的老者说，行礼辞让、修行藏智是身全名遂之道，而设立法术度数以犯众怒是很危险的，劝他不要舍安全之道而行危险之路。但他却不以为然，而义正辞严地表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认为法术度数是有利于民众的一种手段，充分显示了其提倡法治的决心和信心。为宣传其政治主张，韩非写了十余万字的论文。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著作后，赞叹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当他从李斯口中得知文章的作者是韩非后，便马上命令进攻韩国，索取韩非。韩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但韩非到秦后并未受到信用。因为他敢于直谏，遭到了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的谗害。秦王下令将韩非治罪。韩非想见秦王解释清楚，却没能得见。李斯派人送去毒药，逼迫韩非自杀。不久秦王后悔，下令赦免，而韩非已死于狱中了。

韩非的著作经其后学编次成《韩非子》一书。全书共有 50 篇，约 180,000 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所提到的篇名，今本《韩非子》内都有，所说的字数与今本亦略相符。韩非的思想，丰富多彩，它涉及到政法、哲学、社会、财经、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但就其主体而论，则是他的政治思想。以下我们从三方面介绍一下：

1. 法。韩非所说的法，是一种“编著之图籍”的法律条令。可见，它首先是一种成文法，而不是一种习惯法，具有客观性和固定性。其次，它又是“布之于百姓”的公布法，而不是一种秘密法，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制进步的表现。再次，它又是“著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总之，韩非所说的法，具有这样的性质：它是成文的、公之于众的、用来治理臣民的。表面上，它是君臣万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实际上，它不过是君主治国的工具，这就是韩非之法的真正实质。

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主要包括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赏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治犯法的人。它们是韩非之法的基本内容。法的制定应该考虑到以下几项原则：立法应考虑到它的功利性；立法必须因时制宜，适应时势的需要；必须统一，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法令必须适应于人的性情，容易了解，便于实行；法应该详尽明了；制定法律时，必须贯彻厚赏重罚的原则，使法律起到赏善罚恶的作用。以上这些都是制定法律时应当考虑到的原则，它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典法制理论的宝库，但从韩非主张统治权、赏罚权都必须掌握在君主手中这一点来看，这立法权当然也是君主独掌了。这是他立法思想的一个缺

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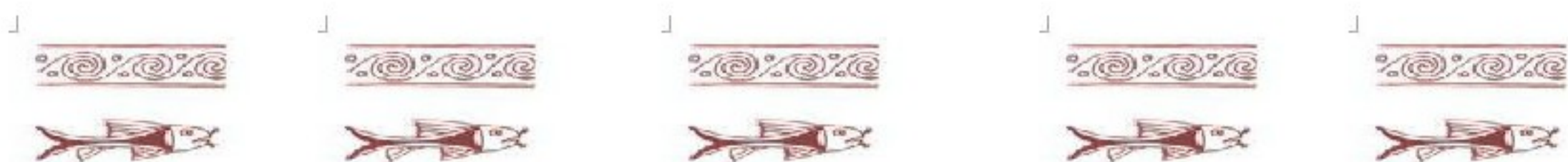
立法重要，执法更重要。因此，韩非还特别论述了法的实施原则。首先他主张加强法制教育，明示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他甚至主张取消所有其他的教学内容，只上法律课，这种观点当然太偏颇，但是这对于加强民众的普法意识却是非常有益的。其次，韩非主张执法时对大臣和平民要一视同仁，赏罚分明，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除了君主以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法律，都必须惩处。法治的可贵，就在于打破封建贵族的特权，它既反映了当时贵族势力的低落和平民地位的提高，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平等意识的增长，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再次，韩非认为执法必须严格审慎。他虽然主张厚赏重罚，但这不是没有节制和尺度的。在执法时绝不能任意妄为，既不能因为仁爱而有功不赏，无功受禄，也不能任意虐杀臣民。第四，韩非虽然反对儒家所谓的“仁义”，但他并不完全否认道德教育的力量，他主张用“毁”和“誉”来辅助赏罚，就是用道德的力量来促进法治的实行。

2. 术。相对于法所具有的成文的、公开的、客观性和固定性的特点，韩非所谓的术就是不成文的、秘密的，是一种君主对臣下的统治手段，它比法要复杂得多。韩非认为在术中形名术是最重要的。形名术主要是考察臣下的言论和行动实绩是否相符，臣下的官职和政绩是否相符。这种形名术是考察群臣的一个较为公允的方法。赏罚是治国的必要工具，而形名术又是赏罚的必要工具，没有形名术，赏罚就会失当，国家就难以治理了。所以形名术既是术治最重要的一种，同时也是法治的基础。除了形名术外，韩非还论述了一系列的用人术，这包括严格把握用人标准，任用德才兼备的人；不论贵贱，以功受官；不听毁誉，以法择人；专职专任，责任明确；基层选拔，逐级提升；用人权必须为君主独掌。这些所谓的术，从积极方面来看，是帮助君主充分发挥群臣在政治中的作用，以加强行政效率，巩固统治；从消极方面看，防止君主统治权被篡夺的治臣止奸之术，是非常阴暗卑劣的，虽然这是当时政治的反映，但也不能不受到后人的非议。

3. 势。韩非所谓的“势”都是指统治权而言的，包括用人权、赏罚权等。他认为只有统治权掌握在手里才是真正的统治者，才能统治民众。而君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主必须“独擅”权势，绝不可以把权势借给臣下使用。因为无论什么权落到臣子手中，对君主都是不利的。二是君主不可以与臣下分享权力。舵手多了要翻船，权力分掌，必然造成政治局面的混乱。三是要运用法治赏罚来巩固君主的权势。君主手中的权势包括赏罚权、执法权等，所以君主可以利用赏罚、法令来巩固自己的权势，如此往返，则君主的权势就至高无上了。四是要防止大臣篡权。

由此可见，韩非主张的法治、术治、势治的结合，就是为了达到君主专制独裁的目的。因为如果没有法，就没有一个统一的行为准则，赏罚就无所适从，术治就难以应付，国家就会混乱，君主的权势也就不能巩固。没有术，法就会被破坏，君主的权势就会被篡夺。而没有势，就是亡国，更无法谈法治和术治了。所以，只有法、术、势相依而治，才能建立起一种大一统的君主独裁统治，这在当时是符合时代要求的。

此外，《韩非子》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理应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韩文中那冷静切实的思考，精辟透彻的议论，峻急劲疾的气势，鞭辟入里的剖析，细密严谨的结构，气象万千的文体，喷薄而出的激情，酣畅传神的人物描写，机智诙谐的语言技巧，蔚为文学大观。这多方面的文学成就，不但形成了韩文深刻明切、严峻峭拔、雄伟森严、激越犀利、生动机智的基本风格，使它成为古代论说文中别具一格的楷模，从而对后世的各种散文体式，甚至骈文、笔记小说之类都发生了伟大的影响。因此，可以说，《韩非子》不仅是我国思想宝库中的一部伟大的巨著，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问奇名山大川 探究自然奥秘

——《徐霞客游记》

◎ 王学艳

明代徐霞客撰。徐霞客（1587—1641），地理学家、旅行家。名弘祖（一作宏祖），字振之，号霞客，明代南直隶江阴（今江苏江阴）人。他的父亲是一位隐居的学者，重视名节、操守，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对少年徐霞客很有鼓励和影响，对成就他的一生事业有过十分重要的影响。徐霞客从小就“特好奇书”，博览古今地志，十分向往“问奇于名山大川”的生活。他22岁开始旅行，足迹遍及今十多个省区。每到一地方，就考察奇山异水的成因，并按日详细记录所见到的情景，用了三十余年的时间，这部《徐霞客游记》就是后人根据他的记录而编辑整理成书的。

《徐霞客游记》是徐霞客30年来探索和研究大自然奥秘的成果结晶。全书目录分为10卷，卷分上、下卷，实际为20多卷，约40,000多字。其中大部分是关于西南和新疆地区的考察记录或者专题的论述，特别是对石灰岩溶蚀地貌的记载，内容丰富多彩，记述翔实精确，具有相当高的科学价值。

《徐霞客游记》的自然地理内容非常丰富。他开辟了地理学上系统观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徐霞客经常走小径，尽量不留空白，每到一地也是尽可能地登高，以便于观察地形，了解山河走势。徐霞客对江河的考察，极其谨慎认真。比如，过去提到《禹贡》有“岷山导江”的说法，然而徐霞客就冲破了此种观念，在历史上第一次论证了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在水文方面，徐霞客



非常重视江河水量的涨缩，对于颜色的变化、江面的宽窄、水流的缓急也极其重视。最为可贵的是，他对河流的流速与流程的关系、河水的侵蚀作用、喷泉发生的

原因等都作了科学的说明。在《徐霞客游记》中还有大量的关于气象的记载，徐霞客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进行气象观察，详细地记录了每天气象的变化，保存了我国古代最详细的气象观察记录。不仅能注意到气候和植物的关系，也注意到气温和海拔的关系，并重视地理位置对气温的重要影响。还有就是对物产的记载也相当丰富，有花卉、林木、动物、矿物、药材等等，并尽力做出标本。徐霞客深入地研究了植物的特征、用途、地理分布等等，比如记载西南花木，比专门记载云南名花的《滇中花木记》多出数十倍，可见记载之丰富。

另外对政区、交通、溶岩、地热等均有翔实的记录，而且此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石灰岩地貌的科学文献，因此具备不可多得的价值。

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还表现出了很高的文学成就。首先，名山游记是写景的佳作，被古今游记选本多次选入。比如记述湘江遇盗、鸡足山顾仆逃跑诸篇，情节曲折生动、跌宕起伏，描写极其细腻，是叙事性散文的名篇。另外他的政论性代表作有《随笔二则》、《近腾诸彝说略》等，议论中肯，切中时弊。再次，《徐霞客游记》由于记载时日多，篇幅大，内容宏富，实在是古今第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游记之多，遂莫过于斯编”。其体例恰恰是为了更好地容纳如此丰富的内容而分类的，有日记正文，是主要部分；有文中说明，是用小字夹注；另有专门条目，是用来补充当地的风土、物产、历史、人物等等的，附于每篇日记后面；部分地区可以独立出来，比如《永昌志略》、《丽江志略》等，能够更集中反映当地的历史。日记正文按旅游路线安排，属于纵的线索；后三部分是对各种问题的展开，形成为横的解剖，因此产生了所谓的“徐霞客游记体”，丰富并发展了日记体游记。

《徐霞客游记》记载了不少的史料，徐霞客能够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能够了解国史、邸报等无法反映的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游记》比较忠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展现了从江南到西北边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生动绚丽，内容丰富又可靠。首先是关于人民生活的记载，其中所到之处有杭州府、衢州府、桂林府、云南府等大城市，也记载了中下城镇和广大农村的人民生活，对人民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都有翔实的描述。在反映人民生活时，徐霞客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是像其他帮闲文人粉饰太平，而是如实地记录了包括王公贵族巧取豪夺的社会现实。同时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也描述的淋漓尽致，比如衡阳的桂王，烧香拜佛的寺庙规模巨大，“八庵联络”，也是导致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还有关于农民起义的描述。明末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不乏记载，但对南方农民起义的资料记载就少而又少，《徐霞客游记》则透露了江南农民起义的线索。比如记载土司镇压当地农民起义的时候，土司兵则事先向农民军报讯。再次，关于宗教的史料。徐霞客是四处游荡之人，多与僧侣相交往，对各地佛寺、道观记载尤其详尽。就他本人而言，也深受佛教的影响，有唯心主义的倾向，但他并没有宗教偏见。《游记》关于佛教的资料已经引起重视，陈垣先生在写《明季滇黔佛教考》时就引录很多，并说：“今欲考滇黔静室及僧徒生活，《霞客游记》为最佳史料。”复次，就手工业、

商业、农业也有相当的记载。比如对各地农村集市就记载了米价、油价等等；另外对手工业中的采矿业描写最为突出；对农业的时令、耕作制度、使用各种工具都有细致的介绍。

《徐霞客游记》的重要地位早已引起注意。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说：“《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察家所写的考察记录。”对于它的文学上的伟大成就，明末著名文人钱谦益曾经评价道“当为古今游记之最”，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等等，其褒奖之词溢于言表。在当时没有先进仪器设备的情况下，徐霞客能够利用野外考察的第一手资料，得出很多与近代科学原理接近的推论，是极其难得的，所以对它的评价很高。



《徐霞客游记》在他本人去世后，由后人整理成篇。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的族孙徐镇将《游记》刊刻成书，是为最早的刻本。后来嘉靖年间、民国年间均有刻本或印本行世。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诸绍唐、吴应寿整理的《徐霞客游记》，采用徐镇刻本、季会明抄本为底本，另外参校了很多家抄本，是为最好的版本。书前有徐霞客像、手迹，另有季会明等人抄本书影，有徐霞客旅行路线图。



西方
著名
著作
展
评

《纯粹理性批判》

◎田文霞

康德（1724—1804）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一位鞋匠家庭，父亲是虔诚的教徒。康德生活的时代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浪潮高涨的时代，而当时的德国还非常落后，资产阶级非常软弱，向封建统治阶级屈膝妥协。同时资产阶级革命意识还在不断增长，康德就是反映这种革命意识增长的巨人之一。

康德的少年阶段是在神学院度过的。在那里，所有的课程都浸透着宗教精神，几乎没有自然科学，他晚年回顾这一段生活时还感慨万分，不寒而栗。1740年康德进入哥尼斯堡大学哲学院，在那里他得到马丁·克努岑的有益教诲。他不仅在哲学思想上给康德以引导，而且还是康德踏上自然科学征途的引路人。大学毕业后，从1747年起，康德走上了课堂和书

斋著述的生涯。他先当了7年的家庭教师，到1754年才在哥尼斯堡大学谋得一个编外讲师的职位，并在一段时间里兼任图书馆副馆长的职务。在这二十多年里，康德虽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名气也越来越大，但几次申请教授职位，都未达到目的。直到1770年，在他46岁时，才以《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成和原则》的就职论文，取得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的职位。

康德一生的贡献是很多的，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大类，1770年以前，康德的主要贡献是在自然科学方面。1775年发表《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提出不同于牛顿的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说，在自然科学界引起轰动。1770年后，他转向哲学研究。康德哲学是以批判哲学为特征的，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及《判断力批判》。康德的哲学体系，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二元论的充满矛盾的体系。它具有先验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主导倾向，同时又包含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合理成分。既有批判宗教神学的方面，又有向宗教神学妥协的倾向。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的一部认识论巨著。在这部著作中，康德承担了为数学和物理学的严密和确定性辩护的任务，他猛烈地批判了长期以来弥漫于欧洲的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形而上学体系，以及桎梏人们思想的封建神学。1788年，康德发表《实践理性批判》，论证宗教信仰的合理性，证实道德法则的理性的确定性和普遍性。在1790年出版的《判断力批判》中，康德详细论述了他的美学理论。这三部巨著以尖锐激烈，富于挑战的言词，在极广阔的领域内提出了一系列有独创性的见解，形成了康德“真”、“善”、“美”的庞大批判哲学思想体系，在德国哲学界引发了一场革命，将自古希腊开创的西方哲学推向了高潮，又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先河。

书名中的“纯粹理性”是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批判”是指对纯粹理性进行考察。康德为此书取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弄清人类认识的来源、范围及界限。因为这个问题在当时有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其一，是洛克的经验论。认为所有一切的知识，所有一切的认识，都是从经验得来，也就是，不含任何先天或固有的意念或观念。其二，是笛卡儿的唯理论。认为所有一切认识都出自人类的心灵，也就是来自理性，因而所有一切的真理无不从纯粹的思维来，不必依赖经验。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理论，在哲学上形成了一个似乎是无路可走的困境。因为，两者的理似乎都无法令人满意。康德动用了他全部智力来思考这个认知问题，于《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他思考的结果和结论。

全书分为篇幅很不相称的两部分：“先验原理论”和“先验方法论”，其中“先验原理论”为全书的关键和主体。

康德认为认识论问题如不解决，哲学只能在歧路上徘徊。他首先批判了唯理论，指出唯理论认为不需要感觉经验，仅凭人类的理性就可以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就可以达到真理，是“独断”和荒谬的，康德坚决认为人的心灵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旧形而上学是虚伪的。康德同意经验论的看法，认为人类的认识开始于经验。但他也批判了洛克否认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认为在实际上是在否定科学知识。康德意识到双方都有片面性，在批判双方错误的同时，也指出双方的说法都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康德的观点是，人类的认识来源于经验，知识来源于理性。依据这一观点，人类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是人的感官提供的后天感觉经验，这些经验是混乱零散的东西；另一个是人类头脑中先天固有的带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能力。人类的认识活动就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对感官提供的后天经验进行整理，才能形成科学知识，因此人们头脑中任何一种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方面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

对于人类如何具有先天认识能力，他认为人类的理性中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形式”，这两种形式先于一切经验，是经验形成的前提条件。这样，即使人的感官没有任何实际对象，“时间”和“空间”也先天地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当人们进行认识活动时，我们所体验到的外部世界就是一连串处于“时间”和“空间”形式中的过程，人们运用“先

天的”思维形式对这一过程混乱零散的感觉材料进行整理加工，人们才能获得感性认识。所以只有从人类的立场，才能谈到空间和时间，它们不可能离开人类而独立存在，他们属于人类的条件，是人类感知的先天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

康德进一步指出，人类通过“时间”与“空间”形式获得的感性认识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感性”只能认识直观材料，不能算科学，还必须经过更高一级被称为“知性”的人类思维活动。而“知性”则是运用范畴、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能力。所以，必须将两者联合起来，才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他把“知性”自身规定为包括统一性、多数性、必然性、整体性等 12 个概念和范畴，“知性”活动把这 12 个概念或范畴运用到直观形式所提供的“感性”材料中去，使这些材料具有必然性和因果关系，才能形成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科学知识。与“时间”和“空间”相同的是，“知性”也不从自然界中得出它的规律，而把自己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所以正如康德所说：“人是自然界的立法者。”

最后，康德指出，人类通过“知性”获得的科学知识，仅仅是对“现象界”的认识。而“现象界”中的东西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能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要超出“现象界”的认识，就要进一步把“知性”的各种知识再加以“综合”、“统一”，把它们整理成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这是人最高的认识活动能力，叫“理性”。康德认为“理性”企图达到最完整、最高的统一体：灵魂、世界和上帝。康德把这三个统一体称为“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都是“现象界”之外的，称为“自在之物”，它是超经验的，不属于人的认识范围，因而不能用“知性的概念”去认识。然而，当“理性”去追求“理念”时，却必须用“概念”、“范畴”去认识它们，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康德把此矛盾称为“二律背反”。康德利用形式逻辑的归谬法来论证“二律背反”，即事先肯定命题的反面，然后论断它不可能，以此推翻对立的反命题，来证明正命题是正确的，从而证明理性要求超出“现象界”范畴，去达到最完整、无条件的“自在之物”的认识是不可能的。至此，康德完成了他的“认识论”学说体系。并骄傲地声称，他在哲学界中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在认识中不是心灵去符合事物，而是事物要符合心灵，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是万能的“自在之物”，是人的认识根本达不到的，是不可知的。在人的认识所达不到的领域，应当留给宗教信仰。

《民主主义与教育》



◎袁飞

约翰·杜威（John Dewey）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是现代西方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859 年生于美国阜蒙特州柏灵顿市。1879 年在阜蒙特大学毕业，曾在中学和乡村小学教过书；1882 年入新建的霍布金大学研究哲学，1884 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在明尼苏达大学和密执安大学讲授哲学。杜威从事教育活动和著作，主要是在 1894 年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主任以后开始的。1896 年，他创设了芝加哥实验学校（通常称“杜威学校”），作为他的哲学和教育理论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学校只存在 8 年，于 1903 年停办。据杜威自己的回忆，芝加哥的十年对于他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关键的时期。《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等著作就是他在这一期间发表的。

美国在经历了南北战争（1861—1865）后，到了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正处于大扩张和大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美国的经济迅速地由自由竞争过度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可是，在教育领域，自 19 世纪上半期以来，美国的公共教育虽然

有了迅速的发展，但学校制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还是继承欧洲大陆和英国旧学校的传统，形式主义的、呆板的教育仍占统治地位。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目的在于改造旧学校，使新一代具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品质，能顺利地投入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中去，并适应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以巩固资本主义制度。

作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者，杜威写了大量的教育著作。有影响的有如下几本：《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及《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杜威 1930 年退休，退休后他仍继续从事写作，直到 1952 年去世。这期间他先后写了《我们怎么思维》、《芝加哥实验的理论》、《经验与教育》及《人的问题》等等。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杜威对旧学校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过批判，对教育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应该看到，杜威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实用主义哲学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教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因为哲学本身就是“教育的一般理论”；事实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如此深刻，以致人们时常称它是一派教育哲学。还应当指出，贯串在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一个主要思想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在他的教育著作中，到处可以看到围绕着这个中心所进行的讨论，目的是如何使学校对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阶级关系起调节作用。很显然，杜威的教育理论和政治理论是统一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杜威曾于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夕来到中国，在许多城市和高校里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他的主要观点，如生活教育儿童中心等，在旧中国曾流行一时，影响很大。

总之，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从 19 世纪末产生到 20 世纪中叶，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庞大体系，在世界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我们在阅读他的教育著作时，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分析和批判，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民主主义与教育》写于 1916 年，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著作，也是他的教育思想最集中最系统的表述。杜威试图把“民主”跟“科学的实验方法”以及“进化论”、“工业的改造”等因素联系起来，并探讨它们在教育上的意义。全书在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以后，提出一个基本观点：这就是“教育即生长”。杜威认为，在教育上并没有一个使其它任何事物从属于它的目的或目标，最接近于一个无所不包的教育目的是生长本身的原则。他说，生长的理想和以下两种教育思想不同：一种主张教育就是从内部将潜在的能力展开；另一种主张教育是从外部进行塑造工作。生长的理想则归结为教育是经验的继续不断的改组和改造。关于教育上的“民主”概念，杜威认为“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是“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为了适应“民主主义社会”的需要，就必须教育社会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能力，必须把生长作为一切成员的理想标准。在这部著作里，杜威还系统地分别论述了教育的目的及经验与思维、思维与数学、教材、课程、职业与教育等等。最后几章，在归结到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时，特别提出实用主义认识论，即所谓操作的或行动的认识论。他宣称，这种认识论的根本特点，是坚持认识和有目的地改造环境的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在教育上是要使学校中知识的获得与在共同生活的环境中进行的活动和作业联系起来，这一点可以说是实用主义教学理论和方法上核心的东西。



一部全新的教材

——学《民族教育学通论》

◎郭军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以民族教育为核心的“多元一体化”的国家文化发展概念的普及和深层次发展。如何在一个多民族国家范围内即解决好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教育发展，又保持国家以至全球一体化，已成为我国民族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但是将其引入教学中作为一门课程来讲授的高等院校还为数尚少，关于这方面的教材更是难得可贵。

2001年5月，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哈经雄教授，藤星教授主编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九五”科研课题项目、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评定的校级研究生教材——《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系统地介绍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基本理论、发展史及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思想等。覆盖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主要方面，不仅填补了国内这方面教材的空白，而且无论从理论的提出、问题的梳理、知识点的整合，还是从章节的设置、体例的编排来说，都不失为一部屈指可数的教材。为推动民族教育学学科教育与发展，特别是为培养高层次学历教育的民族学以及相关专业的教育，提供了一部全新的教材。同时也为民族教育学这一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民族教育学是民族学与教育学交叉而形成的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双重性质。同时，还受其他众多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影响。其中民族科学（民族学科群）中的民族学、教育科学（教育学科群）中的教育学是民族教育学最基本科学（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教育科学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是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

全书编写目的明确——推动民族教育学进一步理论化，学术化。全书从宏观和微观领域出发，以民族教育和多元一体化文化发展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教育科学中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以人类文化共同性为基础，在承认人类各民族几千年所创造的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以及各民族文化具有其存在的相对性与合理性这一事实的前提下，在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上都较以前有了很大的突破。在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透过人类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法告诉人们，民族教育的发展历程蕴藏着一个发展结果——民族教育的发展，是国家多元一体化文化发展的核心，是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社会进步，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重中之重。

围绕上述目标的实现和结构展开，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作为一本民族教育学的通论性著作，论者并没有给民族教育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而是提供多重的视角和开放的研究问题的方法。通过国内外专家学者：单一民族教育说；国民教育说；少数民族教育说；多重含义说；跨文化教育说的五种不同的说法，在对民族和教育的历史与多学科分析的理解上，在构建科学的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前，从民族教育自身具有的跨文化性、学科交叉性、多语言与多文字性、实践性的特点，对民族教育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科学解释和一般表述。

二，全书论述严谨，阐述得当。在概括和介绍的基础上，以民族教育为据，以马克思主义为纲，全书采用狭义的民族教育的概念，即少数民族教育的概念。理论框架和体系基本上是在这一概念含义的基础上的。主要从文化背景及其教育的特殊性以及主流民族文化与教育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及教育对该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与影响的大视角来研究民族教育及

其有关问题。但最后一章，则是从广义民族教育概念的角度，在着重论述了少数民族与主流现代化社会的关系及面临的问题、任务的同时，展示了少数民族教育未来发展的理想前景。

三，突出知识的开放性和实践性，在各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和研究问题而不着眼于对问题的解答，是《民族教育学通论》的又一重要特点。例如：“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就是作者通过多年对国内外民族教育理论和多元文化潜整合教育理论的潜心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实施“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亦称为“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教育，在担负着人类共同文化成果传递功能的同时，不仅要担负传递本国主流民族优秀文化的功能，而且同时也要担负起传递各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功能。其教育的对象不仅包括少数民族成员，而且也包括主流民族成员。其目的就是继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多民族大家庭在经济上共同发展，在文化上共同繁荣；在政治上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友好与和睦相处，最终实现各民族大团结。

四，全书按照章节的形式来编排体例，将凝练出的每个核心问题又分出若干节点，每个节点都含有丰富的信息量和翔实的参考资料，可以单独成篇，为读者提供了个性化的学习和研究空间。如第九章‘民族教育体制与管理’，在充分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教育的基础上，没有简单地阐述教育理论，在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教育所取得的伟大实践与辉煌业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改革历程经历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背景和生产水平落后的基础上的起步及经历的风风雨雨和克服的重重困难。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和总结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事业伟大实践与光辉历程，展现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探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建设的客观规律和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进一步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教育学理论化和学术化的不断前进。

五，内容丰富翔实。《民族教育学通论》一书主要包括了民族教育学基本理论、民族教育学发展史与学业成就归因理论、世界民族教育及跨文化概述、自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与民族教育、民族语言与民族教育、民族心理与民族教育、民族教育法规与政策、民族教育体制与管理、民族幼儿教育、民族基础学校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师范教育、民族成人教育、民族教育学研究方法、多元文化社会与多元文化整合教育。为了学生能更深入地从事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民族教育学论》除了在每一章后列出参考书目和思考题以外，还在附录中列出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及主要分布地区、中国民族自治区地方简表、中国民族院校概况、中国民族教育大事记（1949-1998）以及作者简介。

六，该书是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的教学、科研人员经过十几年的潜心研究，共同劳动的结晶。编者中既有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研究领域首先提出了独特的“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即“多元一体化教育理论”的著名教育学家藤星教授和原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教授，又有名不经传的普通教师，无一不以严谨治学的学风、实事求是的态度，在对我国民族教育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的同时，充分吸取了国内外有关民族教育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而形成的。以人类文化作为切入点，以中国民族教育未来作为参考系，在阐述基本理论、研究方法和历史进程时，必以具体的详实的数据充实之。

全书的宗旨是为培养学生对民族教育的研究将改变原来单一的教育体系划分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一体多元化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学科视野，打破了学科界限，以整合原有的狭窄思想体系。《民族教育学通论》中翔实的资料、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多角度的研究视野，为从事民族教育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引领学生进入“多元文化整合教育”研究的理论中并去发现更多的关于民族教育研究方面的问题。

《民族教育学通论》



评《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

◎王波



《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全面揭示生物物质时代的新经济法则》英文原名为《The Coming Biotech Age——The Business of Bio-Materials》。由美国学者理查德·W·奥利弗（Richard W. Oliver）著，曹国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在这部书中，作者预言，生物科技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的影响，生物技术的崛起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把网络经济从衰落中挽救出来，从而形成一个以往任何时代的增长速度都无法比拟的发展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开始大力发展信息、网络技术，到90年代，信息、网络新产品问世，形成了信息网络产业，使美国经济持续10年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如今，“新经济”发展受挫，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更新的技术将取而代之，他把这一时代同时称为“生物物质时代”。

在《即将到来的生物科技时代》中，我们会看到一些重大的生物物质领域方面的进展，如，为个人的基因构建定制药品、通过基因修正的方法生产健康婴儿、抗毒害和抗疾病的食物、模仿人类生物过程的智慧型材料、永能器等等。生物科技将解决信息时代的诸多尴尬，使人类能获得类似超越自然的享受。对于作者极富预见性的描述，我们读起来会感觉非常有意思甚至不可思议，但在未来，这一切将逐渐成为事实。那将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很多人将会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读过这本书的人们在几十年后会惊叹：“哦！在几十年前，我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果然……”

在本书中，作者没有使用任何令人畏惧的学术用语，但是描述了重大的生物物质的进展，为我们呈现了未来科技发展的奇妙图景：生物物质研究中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领域是“智慧型”感应器，之所以被称为“智慧”，是因为它们不仅能够感觉，而且还能学习和记忆。例如，让包装材料能感觉食物的保存期限，一旦食物即将过期，其包装就改变颜色以提醒消费者注意；某些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的新型智慧材料，可以模仿人类的生物过程，如电子耳、电子鼻、电子舌，甚至电子头脑。电子舌可以测量溶液中的不同化学物质；另外几种模仿的人类器官，可望广泛应用于工业与卫生保健市场。科学家找到了更合乎环保要求的能源使用方式——燃料电池技术，这种技术的最大好处是汽车排放的废气只有水蒸气；塑料将不以石油为原料而完全以玉米替代；建筑材料将由洋麻等纤维类作物替代；石油的枯竭也不再可怕，因为用秸秆完全可以替代；2050年人类的寿命有可能达到120岁；5亿亩的不毛之地、盐碱地将会成为植物的生长乐园。

本书作者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他们了解生物科技时代必须知道的东西，更重要的在于，他正试图从生物科技与社会经济互动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阐述最近生物技术的各种应用和未来发展，使人们能以一个新的层面来理解作者所希望出现的生物科技可能带来的极大震撼，以及对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使我们能洞察到未来生物科技的发展，自觉地将自己定位在一个正确而有利的位置，从而把握时机。作者认为，生物物质工业将带给人类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它对生产方式的变革将远胜于以往任何的技术革命。但他同时指出：“没有人真正知道未来，本书所说的也只是未来经济和科技的种种可能。”未来生物科技也不太可能和其他科技发生互动而独立发展；相反地，生物科技将和各种产业结合，以各种面貌、在各种生活层面，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现在的生物科技就像30年前的电脑业。和电脑一样，未来20年，生物科技对你生活的影响之大，将超乎你的想象。”我们现在已经处在信息时代的尾声，即将迎来一个全新的生物科技时代。一场改变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革命即将到来！

评《拿破仑传》

这是一部“纪史”性著作，它对拿破仑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和一种人格的两面性，给予尽情揭露。作者在全面和充分肯定拿破仑的伟大历史地位、他的卓越天才和功绩的同时，也将他“方方面面拆开来看”，以一种冷峻的眼光，撇开加在拿破仑头上的种种光环，还他以一个非虚拟的、实实在在的伟人形象。书中充满深刻的评点和辛辣的剖析，读来往往妙趣横生，发人深省。拿破仑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西方历史伟人之一。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毛泽东就将拿破仑与华盛顿并提为“西方资产阶级英雄”，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人物的传奇一生，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崇敬。本书以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描述了拿破仑一生中经历过的各次重大战役及其辉煌的军事成就。从历史传记的观点来看，这些陈言琐事、家长里短，往往是些零散的历史痕迹、宝贵的证明材料和指标，从中可以窥视传主的内心奥秘，寻求这位非凡人格从生成到泯灭的心理轨迹，探索拿破仑及其帝国悲剧命运的蛛丝马迹。

拿破仑一开始自认是一个外国人，一心希望有一天能够让科西嘉从法国独立出去。16岁时他被授予炮兵少尉头衔。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拿破仑回到科西嘉，希望推动科西嘉独立，但遭到另一个亲英反法

的保利集团排挤，最后全家逃往法国。1793年7月，拿破仑带兵攻下了保王党的堡垒土伦，因此受到雅各布宾派的赏识。1794年热月政变中拿破仑由于和罗伯斯毕尔兄弟关系紧密而受到调查，后因拒绝到意大利军团的步兵部队服役而被免去准将军衔。1795年他受巴黎督政官巴拉斯之托成功平定保王党武装叛乱，一夜之间荣升为陆军中将兼巴黎卫戍司令，在军界和政界中崭露头角。

拿破仑是一名出色的军事家，对当时的军事知识深有研究，善于将各种军事策略运用于实战之中，尤其是主张将火炮集中使用，以及充分发挥骑兵的机动作用。1796年在意大利，拿破仑统帅的军队多次击退了反法同盟联军，最后迫使对方签署了有利于法国的停战条约，凯旋而归。

取得意大利之役的胜利后，拿破仑的威信越来越高，他成为法国人的新英雄。而他的崛起令督政府感到受威胁，因此任命他为埃及军司令，派往东方以抑制英国在该地区势力的扩张。在拿破仑的远征军中，除了2000门大炮外，还带了175名各行业的学者以及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在远征中拿破仑曾下达过一条著名的指令：“让驴子和学者走在队伍中间”。拿破仑

张敬荣

本人精通数学，同时还十分喜爱文学和宗教，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十分大。

1798年远征埃及本身是一个大失败。拿破仑的舰队被英国的海军上将纳尔逊完全摧毁，部队被困在埃及。1799年回国时，400艘的军舰只剩下2只小舰，原本侵略印度的计划受阻，人员损失惨重。

此时欧洲反法联盟逐渐形成，而法国国内保皇派势力则渐渐上升。1799年8月，拿破仑最终决定赶回巴黎。1799年11月9日，回到法国的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获得成功，成为法国第一执政者，实际为独裁者。

拿破仑之后进行了多项政治、教育、司法、行政、立法、经济方面的重大改革，其中最著名并且直到今天依然有重要影响的《拿破仑法典》，是在政变的当天晚上由拿破仑下令起草的，很多条款拿破仑本人亲自参加讨论最终确定，基本上采纳了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比较理性的原则。法典在1804年正式实施，即使是在一个多世纪后依然是法国的现行法律。法典对德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立法起到重要影响。

拿破仑战争无疑起到了巩固法国革命成果和推动欧洲封建君主制度瓦解进程的积极作用。但这同时是一种以战争形式施加于法兰西国内外的“恐怖主

义”(马克思语)。《拿破仑传》的历史叙述不但让读者再次感受拿破仑的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的雄才大略，身先士卒、驰骋沙场的英雄气概，而且也向我们展示一幅幅可悲的战争画面，以及掩藏在这些表象后面的种种野心和阴谋。在拿破仑自诩他“一路满载声誉和光荣”的征途上，铺垫着欧洲和相邻地区数以百万人计的生命，充满了士兵们从“倒下的同伴身上割肉烧来饱肚”，妇女儿童为免遭屠杀“宁愿去找鲨鱼结伴逃生”的种种惨状。

拿破仑有为实现自己梦想所必需的品质。他不但智力过人，而且艰苦奋斗，身体力行；他言必信，行必

果，办事雷厉风行；他惜才、爱兵，宽容大度，善得人心。

《拿破仑传》说得好，自古以来要说全凭自己的才干赢得天下，非拿破仑莫属。但是他脱离人民群众，惧怕人民的崛起，扬言“如果我必须下台，我也不会把从革命派手中接过来的法国拱手交还他们”。拿破仑最后丧失了人民的支持，并被身边的叛徒出卖。拿破仑与其说败在滑铁卢军事战场，不如说毁于巴黎政坛。这是拿破仑的真正悲剧。

这不是一个犹如雾里看花、“一千年才出现一次”(拿破仑身边大叛徒塔列朗语)的概念化超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之躯和七情六欲的生灵。他是智力上的

巨人，道德上的矮子；历史风云中的英豪，尘世生活里的俗夫；战天斗地的勇士，又是命运的玩物和牺牲品。

拿破仑曾说：“我的一生是怎样的一部长篇小说啊！”本书第一次以拿破仑的情感为线索，从儿子、兄弟、丈夫、父亲和情人等多种角度，生动、系统、全面地对拿破仑的军事、政治和感情生活进行了细腻的揭示，读完此书，您会从中得到不少的教益，更深刻地把握生命的涵义，同时您也将不得不说，不管历史怎样评价拿破仑，至少，他将永远立于人类历史上千古不朽者的行列。



移天缩地 咫尺南极

——评张宗堂《咫尺南极》

◎陈新颜

无论在百度，还是谷歌，只要键入“南极洲”三个字，马上就有超过100万条信息供人查阅。几百年来，抵达南极海岸，或者深入南极大陆的人以不同方式，向世人介绍这片神秘大陆的点点滴滴。对于向往南极的人来说，这些手迹落英缤纷，虽然珍贵，却失于片面。《咫尺南极》，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种信息传递的状态。

《咫尺南极》，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者张宗堂，新华社国内部中央新闻报道中心政文室记者。2005年11月，张宗堂跟随中国第二十二次南极科学考察队远征。期间，历时四个半月，海域行程两万多公里，陆地行程几千公里，先后两次深入南极大陆最壮美，也是最危险的格罗夫山区。难得的经历，特殊的视角，给作者提供了良好的写作素材，也成就了一本相对系统，比较全面的作品。

首先，记者的特殊视角、特殊身份给作者提供了记录这段经历的先决条件，作者也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咫尺南极》涵盖了极地知识的重新解读、南极之旅的全程纪录、内心感受的真诚表达，对于希望了解南极洲的读者来说，本书提供了比较系统、比较直观的描述。说到本书的全面、直观，就必须提及记者与科学家、与作家的身份差别。1984年中国首次派考察队赴南极至今，已有3000多名中国人抵达南极洲，其中2000多人登上南极大陆。在陆续奔赴南极的国人行列中，比例最大的自然是从事科学考察的队员。此外，周国平、邵滨鸿等一批文化学者也曾前往长城站作短暂停留。由于南极夏天短暂，科学考察工作紧张繁忙，有的科学家虽屡次造访南极，却很少留下只言片语，即便有，也只是简单的工作记录，或生活日记。并且，这些记录极少通过媒体与读者分享。至于文化学者，大概是因为海路遥远的

缘故吧（抵达中国南极中山站只能乘船前往，正常行程两个月，最短需要近一个月），迄今为止，还没有文化学者真正登上南极大陆，并在此长时间驻足有作品传世，这也是国内有关南极洲的作品或零散不成集、或过于突出科研、地理色彩而少情感表露的原因。

这里就显出了记者的职业优势——这是一个可以长时间随科学考察队在南极大陆工作生活，并以写作、以作品传世为目的的群体。从《咫尺南极》可以看出，作者从上海启程开始，就始终以热切的目光观察、发现不断向南的旅程中发生的一切，以职业的笔触记录在考察队被熟视无睹、在读者看来非常稀罕的情和事，甚至，在枯燥、单调的生活中，作者会主动寻找、创造事件，在事件中形象传达南极洲的特色。像“记录日出”部分，作者与同伴一起，在南极洲拉兹曼丘陵的寒风里守候近十个小时，记录了南极洲极昼刚刚结束时晨昏同在，日落即升的旷世奇观，同时也生动表述了极昼极夜更替瞬间的自然知识。

其次，新华社的视角决定了本书的高度。在我国派出考察队探索南极的二十多年里，以不同方式登陆南极的中国记者已经超过百人。“铁打的考察队，流水的记者”，二十多年里，只有中央电视台每年派记者奔赴南极，地方媒体是依次排队前往，而新华社在张宗堂之前派人随队登陆南极还要追溯到二十年前。不可否认的是，地方媒体记者行列中也有笔触生动者，但一来他们有的目的特殊（譬如四川电视台赴南极拍电视纪录片——《长城向南延伸》），二来大多数地方媒体策划不够周密，很少有作品出版。再说中央电视台。应该说，在与新华社的媒体竞争中，央视处于领先地位，但这仅仅体现在画面的直观、生动——二十多年来，南极洲的繁忙工作让央视记者很难有时间坐下来（央视记者除了拍摄、制作、传送外，还要担负考察任务），因此，时至今日，没见到署名中央电视台记者的文字作品与读者见面。

本次张宗堂赴南极前，新华社记者已经随考察队前往珠穆朗玛峰、马里亚纳海沟和北冰洋，于是，新华社策划了“南、北、高、深”地球四极探索丛书，为丛书作序的位梦华等人也是中国极地领域的泰斗级人物。评价这样的视角，我们只能用“高屋建瓴”这样的词汇。这样的整体规划之下，《咫尺南极》视角自然会提高，书中对南极洲自然地理描述的准确性、对中国南极事业陈述、评价的权威性也毋庸置疑。在南极洲孤悬海外难以到达，南极知识介绍常有出入、偏差的情况下，国家通讯社出版的图书，自然会给读者提供准确、权威的南极印象。

第三，《咫尺南极》图片丰富精美，在国内有关南极的作品中达到这一水准的非常罕见。目前，读者要领略南极绝美的风光，了解考察队不为人知的生活，大多要通过各种媒体提供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历次考察队员驻足南极期间拍摄的。工作的繁忙、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一名队员很难拍到数量可观的图片。胶片时代，队员回国后四散回到各自的岗位，有些难免失去联系，这样，一名队员，尤其是身为记者的考察队员难以拥有数以百计的精美图片，读者也就失去了一次欣赏很多图片的机会。近几年，随着数码相机的广泛使用，图片复制变得简单易行。作者在南极之旅中，除了自己拍摄、保留了大量图片外，还复制了队友的大量图片。这样，读者就在《咫尺南极》中看到南极洲辽阔的冰原、壮美的岛峰，憨态可掬的企鹅、静美圣洁的冰山。同时，也了解到为了国家的极地事业，考察队员在地球最南端难以入睡的极昼里，极夜暗无天光的黑暗中，忍受着怎样的枯燥、寂寞，经历了几多的危险、艰辛……

作者书中的叶加平曾说，上帝只能喜欢阿蒙森、斯科特（分别是挪威、英国探险家，他们先后靠人力到达南极点，并分别在两次探险中殉难），我们到南极洲只能是在上帝身边工作。我相信，这是中国很多极地人共同的想法。套用作者书中的一句话，“如果把一切都当成一次机会，你就会更加认真地安排自己；如果你看什么都可爱，那将是另一种境界”。作者张宗堂以这样的心态在五万里海路中孜孜不倦，在地球最南端不辍笔耕，于是，我们就有机会移天缩地咫尺南极了……

读《方成讲幽默》

◎金英玉

方成，我国老一代漫画家，生于1918年，广东中山人。出版有个人漫画集、杂文集、漫画理论等著作30余种。曾获中国首届漫画大赛“金猴奖”、“金猴荣誉奖”，漫画《武大郎开店》获人民日报“美术奖”，理论著作获“子恺杯”漫画理论首届“特别荣誉奖”。主要作品有漫画集：《方成漫画选》、《幽默漫画》；连环画集：《康伯》、《王小青》、《方成连环画集》；散文集：《挤出集》、《高价营养》；理论著作：《幽默、讽刺、漫画》、《笑的艺术》、《报刊漫画》、《滑稽与幽默》等。

该书200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我的人间喜剧》漫画家系列丛书之一。《我的人间喜剧》系列丛书收集了我国老一代著名漫画家1927年至2007年的部分随笔散文、杂文及漫画代表作品，共七册。《方成讲幽默》收录方老150幅漫画佳作及哲理深刻的杂文漫谈，内容涉及国际时事、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经济活动、文化艺术诸多方面，偏重于对幽默的理论探讨，是方成漫画艺术的精品。

方老告诉你：幽默是一种语言方式。

方老先生给幽默定位很高，他觉得“幽默是一种高级的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在《幽默定义》中，方老是这样解释幽默的：幽默就是一种语言方式，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文明程度后，自然会产生这种语言方式。幽默不是直接告诉你什么，而是间接地说一句话，让你体会，让你回味，让你琢磨。方老结合自己的创作说：“漫画是一种表意性的，用来发表意见的画。漫画又是语言的艺术，须用幽默语言方法，才能造成寓庄于谐的效果。”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很早就出现，如明朝李士达的《三驼图》，画三个驼子，题诗：“张驼提盒去探亲，李驼遇见问缘因，赵驼拍手呵呵笑，世上原来无直人。”

方老告诉你：幽默不等于滑稽。

逗笑的多是滑稽的，但滑稽的往往不是幽默的。滑稽往往一笑了之，没什么内容和意思。幽默出之于人的智慧，滑稽往往出之于偶然、无意中。方老认为，滑稽的逗笑不是由人的智慧造成的。人与物之间，也会有滑稽的事情发生。从高处落下个塑料袋，恰巧掉在行人头上，把眼蒙住，别人看了会觉得可笑的。这种无意中发生的可笑事，就属于滑稽。而幽默能让人感到美妙动人。巧妙地安排、组织语言，出人意料的新奇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必然源于智慧。“不用人所共知的一般直叙，而是用曲折、含蓄的方式说出来，使人一想就领悟其含义，继而笑起来。”侯宝林《夜行记》里讲侯老先生买旧自行车的那句话：“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这是典型的幽默。

幽默在方老生活中是极其重要的，不管何时何地，幽默似乎贯穿了他的整个生活细节。对他来说，幽默成了一种养生之道。方老为人幽默，作画幽默，谈吐幽默。一次他去山西汾酒厂，厂长听说方成光临，出门相迎说：“久闻大名。”方老颇显机智，回礼道：“大闻酒名。”方老在70岁前还没有白头发，有人就问他：“你怎么没有白头发？”他说：“白的都掉了。”

一幅《武大郎开店》，寥寥数语点明老板用人时心胸狭窄的主题：“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用！”一幅《师父太忙》，家喻户晓。面对责问“手艺太糟了！鲁班师傅呢？”伙计无奈地作答：“开会去了。他是劳模，又是代表，还是委员，一个月要开三十天会呢。”这便是方成笔下讽刺漫画的幽默。

自1946年在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画人物漫画以来，方老先生已画了60年的漫画。60年来他以笔代枪，凭着自己对社会时弊的理解，绘出了一大批脍炙人口、发人深省的漫画作品，同时，痛快淋漓地成就了他的漫画人生。



情系民族 心系发展

——访经济管理学院马林教授

李晓凌:您作为学校优秀学科带头人和国家民委特殊贡献专家是如何发挥带头人作用的?能谈一谈吗?

马林:学科带头人就要起到带头人的作用。必须依据学校确立的办学宗旨和办学定位组织全院教师共同努力。始终以学科建设为中心,抓住重点整合资源凝聚特色,大力提高学科水平在重点学科建设、科研氛围营造、学术团队培养、科研成果积累等方面作大量工作。具体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1)明确目标,突出特色。经过认真研究、多次调研、反复论证明确了“一线四点”的工作目标,突出应用加民族的特色和优势;(2)搭建平台,整合资源。在2004年4月成立了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作为研究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平台,形成以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学术梯队,围绕“一线四点”来组织申报课题、撰写论著教材、发表论文,举办学术会议,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等形式多样的学科建设工作;(3)营造氛围打造团队。中心成立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开展“每周一讲”学术活动,组织教师就自己的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并邀请二十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专家到我校作学术报告。同时,支持我院教师积极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还积极承办本学科领域的相关学术会议,提升了我校的学科地位,也扩大了我校的知名度;(4)抓重点人,作重点项目。对科研能力较强和潜力较大的教师重点培养,并带动围绕一个中心积累成果申报重点项目,培养一批青年科研骨干。

李晓凌:您连续四次申报国家社科课题,四报四中这样的成绩在学术界是非常突出的。请问您是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

马林: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我总结出几点体会可以谈一谈。第一,要确立目标明确、方向和思路。有战略目标没有战术目标等于空中楼阁,有战术目标没有战略目标等于盲人摸象。大目标才有大思路才有大成就。第二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搞科研、申报国家课题的过程必须要走三部曲:第一步,首先把论文写好这是申报课题的基础;第二步:抓好院级和省级课题的申报工作解决课题的起步问题和系统思维的问题是论文的延续;第三步,申报国家课题解决上台阶、上水平的问题。第三,关注热点,悟性启动,持之以恒,厚积薄发。要经常把握了解自己从事专业和研究方向的最新动态和前言性的信息;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第四,确立固定的研究方向持续研究。没有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凭兴趣搞科研研究的范围广而杂会走很多弯路。第五,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团结协作形成学术团队。发挥调动每一位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形成1+1=2的优势组合。

李晓凌:作为院长您能否谈一下三年来经济管理学院有哪些方面的创新?

马林:首先在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和师资队伍方面我们首先推出了“三三制”责任体系。现已在全校推广。其次,在教学改革方面有一定的突破,近三年我院承担校级教学改革项目18项,其中1项在全国首创了旅游专业的毕业设计模式,在2004年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旅游专业教育研讨会上,得到了同行的一致认可,提交的论文获得了大会一等奖。另获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2005年率先启动了二级学院教改项目的立项工作,目前已正式立项5项。2006年我校教改项目申报中,我院已申报校级重点教改项目4项;一般项目9项。第三,实践教学体系建设方面有了长足发展。经过两年多的建设实验用房、设备教学用软件等得到了较大的改善,基本上能够满足实验教学的需要;现有的教学计划中所列示的所有实验课开出率达到100%。近三年来,独立开设的实验课累计已达到20余门次;已

经建立的20个比较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建立了一支由47人组成的校外实践指导教师队伍。第四,通过制定《经济管理学院学风建设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条例形成了以“辅导员、任课教师、学生干部”三位一体的学生学风建设考评体系。第五,在旅游管理专业进行了文科毕业设计的探索,先后做了“大连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营销策划方案”等方案得到当地政府和景区的认可,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并进一步总结文科毕业设计的经验,在各专业中逐步推广。第六,注重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我们创立并重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建设,使该学科在2005年被评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管理学目前已成为校重点扶持学科。以此为平台很好地实现了科研为教学服务的目标。

李晓凌: 您兼任大连民族学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该中心的成果如何?

马林: 大连民族学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是于2004年3月依托经济管理学院成立的校级学术研究机构,并于成立时被批准为大连民族学院重点学科。2005年11月该中心被批准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重点学科。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工作人员29人,其中博士4人、教授6人、副教授8人。

中心有四个研究方向: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地区绿色产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与边贸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坚持科学的、全新的可持续发展观,结合民族地区实际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族地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探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对策。本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并实施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提供参考,这对探索全国不同地区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丰富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同时本研究中心还将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培育和输送高学历、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使其服务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心成员主持(完成)21项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1项大连市社会科学基金。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60多篇;主编、主笔出版著作、教材30余部。最具有特色和社会反响较大的研究成果——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库(《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等10部著作)正由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对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比较翔实客观的分析论证。研究中心共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6项,获得大连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大连市科学著作奖等10项。



马林教授简介

马林,男,回族,1957年10月出生。1982年1月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复旦大学经济学助教研修班结业。现任大连民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民族地区可持续研究中心主任、学校优秀学科带头人、兼任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中国生态经济学会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辽宁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理事长、大连市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大连市旅游产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鄂尔多斯市政府旅游发展顾问。

26年来一直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旅游规划、旅游营销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显著、业绩突出。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国家民委有突出贡献专家等各种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

共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4项;中央民族大学“985”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项目子课题 1 项；省部级课题 8 项；政府、企业横向合作课题 20 多项；1997—2004 年连续四次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四报四中。

在《经济地理》、《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生态经济》、《旅游学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等国家级、省部级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 40 余篇。主编《内蒙古可持续发展论》、《民族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文库》等专著 10 余部。

2002 年与内蒙古电视台合作策划并拍摄了五集电视政论片《鄂尔多斯之路》。全面、客观地总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之路。中央电视台 2 套和 12 套、内蒙古卫视播出后社会反响巨大。2004 年以来主持的大连民族学院旅游教改项目，毕业设计和旅游策划填补了我国旅游高等教育的空白。

1997 年获内蒙古第五届社科优秀成果青年奖；2000 年获得内蒙古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2003 年两次获得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奖；2003 年获内蒙古第七届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998 年被内蒙古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0 年被内蒙古政府授予劳动模范称号；2002 年入选内蒙古自治区新世纪“321”人才工程一层次人才；2003 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称号。2004 年获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会优秀论文一等奖；2005 年获大连民族学院科研标兵、大连市“十佳”旅游教师称号；2006 年获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大连市“十佳”旅游教育工作者。



“记忆”教授

——访外国语学院耿志教授

刘江龙：为什么选择读湖南师范？为什么学外语专业以及当教师？

耿志：我所在的学校外语专业是最好的，是 211 和 985 学校，并最早有博士点学校之一。在国内各本科师范院校中，我们学校是比较好的。我为什么学习外语呢？与我出生的年代有关。上初中时边上学边打乒乓球，早晨上课，下午和晚上打乒乓球，所以我理科学得并不好，基础一般，后来我球也没打好，就不打球了，开始准备去考学，当时我没有选择。那时只是一个机遇，我母亲同学的哥哥在浙江大学教书，是教外语的。他退休以后，就在家里当家教，我就开始跟他学，他是做科学研究的，比较有方法，那时候，我基础差，但就是记忆力非常好，他每天给我讲解一小段，不要求别的，让我理解意思，然后默写。很快，我就从高一上学期十多分，到下学期考到了一百多分，学文科后我一直在重点班。可实际上，要是和我們以后的学生相比，我们还是储备不够的。当时学的东西比较浅。我学外语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无奈。也许靠记忆力好吧。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读书，隔壁家有一位伯伯，他有很多存书，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把《红楼梦》、《三国演义》、《二刻拍案惊奇》等都看过了。就是到今天我还能把《三国演义》的第一段话背下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这对我学习外语有很大的帮助。记忆力不好学外语很困难的。我在初二的单词比赛中获得了全年第一名。为什么当老师呢？因为当时全国的外语学院很少，最有名的北外、上外、广外等加起来也就几所，几乎所有的外语专业都是师范学校，几乎学习外语的也都是师范学院培养出来的。当年，我考大学时，本科只招收九十人，如果考试考到九十名之外，就上不了大学了，只能上专科。当时选择外语专业也是外语人才少，也就顺其自然了。

刘江龙：为什么来民院工作？你在外国语学院主讲的课是哪些？今后的发展？

耿志:我在湖南专业团队、教学、科研、人际关系基础是比较好的。当时来大连也与其它院校联系了包括“辽宁师范大学”。说实话我弟弟在大连工作了很长时间，喜欢这个城市，也建议我来，风景环境、气候等好一些。当然我们学校各方面比别的学校也好。也尊师重教，而且民族学院是一个新学校，有很大的潜力和前景，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束缚。而且民族学院，有很多人来自五湖四海，有一种新鲜感，让人觉得年轻，有活力，有创造和发展的机会。我主要是研究语言翻译。教大二大三的学生。我觉得民族学院的学生素质很高，普通的高学校里只有一门是关于翻译的课程《翻译理论与技巧》。可是我们学校开了很多门，比如《高级翻译理论》、《英汉语言对比》等。都是选修课，供学生们选择，可是在别的学校，这已经是研究生的课程。我们学校的本科就已经开设了。给学生们提供更高的知识体系，起到一个厚基础、宽口径搭建一个平台的作用。我们专业出去的学生很好，上我的课的学生积极性很高。因为课程开设要讲规律一般大三开，语言的知识、英语、汉语的修养要到，内容比较时尚，讲究技巧，学生面临这样那样挑战。比如说写论文、查资料、翻译和写摘要。我的工作、学习是比较喜欢自由发挥的，也是比较放的开的。从我研究今后的发展来说，有两个方向。我最近在考虑，我再跟外语学院的领导商讨，一是开一个新的专业，翻译专业，这是一个顺应时代的需求的选择。在国内是非常好的专业。去年教育部批了三所，今年又批了四所，称为“七匹狼”。国家非常重视，国家教育部新发布的条例，将翻译作为一个专业。从语言学中分化出来，成为实用性的科目并分了两个科目，一个笔译培养为主，一个是口译培养为主。从一个三级学科变成一个二级学科。我觉得应该要更多考虑拓展的一个专业。我们学院应该尽努力上这个专业。二是做课题研究，发展一个团队，团结了一些有兴趣爱好老师，一起来做研究课题。我们现在有一个文化与翻译的“三无”研究所，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实际是个书架子。我们现在和一个美国的太平洋教育研究所合作一个课题，我们民族学院是最早在和英美合作的学校之一。这两年开始，我们的成果慢慢地开始展现出来。我们出了十本专业的研究成书，也是陆续出版。我们继续在国外搞合作的东西。我们在团结老师做科研上有些贡献。对年轻老师的培养也是必不可少的，使他们得到了很多帮助。外语专业越来越走上正轨。就我个人而言，把我的方向作的更完善，精力还是放在语言对比基础上，来探讨翻译。在找出翻译的规律、做一些理论性的研究的同时，也在搞实践方面的东西。从我来民族学院开始，我已经翻译了八十万字，并出版了三十万字的论文，还有五十万字在等着出版，这对我来说，一个是提高自身水平，另一个也对我的教学有更好的帮助，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算是帮我在教学时，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吧。

刘江龙:学生花很多时间学习外语，那么他们学过之后，未来的发展如何？学生应该怎么把握？如何理清专业理论的脉络？请你为学生指点一下迷津。

耿志:中国的学生学外语，李岚清副总理在九十年代初，对中国外语教育打过一个比喻：中国学生学的是“哑巴英语”。外语和母语的学习有很多的不同，中国外语教育几十年，走的弯路太多，必须要改革。中国外语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应试型的，中国学生的语法、单词都背得很好，题目做得也很好，是读写很优秀，可是一旦使用，实际交际能力就差了，看出差距了，存在很大的问题，这违背了外语学习的规律和初衷。我们学外语应该是交际的，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培养的都是实战性不强的学生。语言学习，是从说话，到听别人说话、写文章，应该是读写跟上，我们大学的教育是读写为主，听说为辅。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培养的学生实战能力不高。当然这也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造成。环境对于学习外语来说是很重要的，中国没有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我们尽量要培养外语交际的环境。我们要淡化考试为主的学习方式，不是为了过四、六级，而是真正的可以交际，这样对工作才真正有益。不要把我们的学生塑造成高分低能的人，一旦到了外国就不会说话了。包括我们有些老师也一样，好的要两、三月才可以沟通。好的交际应是沟通。尽管我不觉得李阳的方法有多好，但他学习外语敢大胆说外语的方式非常值得学习。只有说出来了，把握它本质的东西，而不是皮毛，

写作能力、应用能力才能提高。

刘江龙：大学的社会实践或勤工助学，从国内和国外对比着来看，就这方面谈一谈。

耿志：在外国不叫勤工助学，在他们的大学里面，有一个 student set 机构相当于学生会，有的时候，它们提供一些机会让学生来动手，甚至有些大学一些工作让学生来做，然后按小时来付工资。美国有很多老师也设立助手。这样的话，对学生的知识也是一种强化性的锻炼，学校应多为学生创造些勤工俭学的机会，多给学生一些参与的机会。学生活动多，尽可能丰富多彩。也是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但是绝对不要因为学生的工作来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业余工作不能影响学习。学校还是应倡导以学为主，一个学校的学风很重要。老师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大，无论是哪个专业的老师，如果他们不能给学生树立一个榜样，那么他就不配在高等学府里教学，这就要求他的学识、科研能力都很过硬。他必须要有研究，有创新，接受比较前沿的东西。如图书馆许多工作可让学生来做，念死书不能够真正成才，学校尽可能创造更多的助学机会。

刘江龙：都说书是知识的海洋，图书馆是汇集人类知识的宝库，那么您对图书馆怎么看？

耿志：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地方，我在上学的时候要每天都提早去抢座位。我们对知识的追求越来越强烈。图书馆要以读者为中心，多为读者考虑。现在电子媒体对纸质图书来说是一个冲击。好多人都有电脑。在网上就可以查到需要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图书馆也是不可以缺少的，如何去拓展一个新的途径也是图书馆保持它的位置的一个方式。我们图书馆有一个政策非常好就是文献传递，对老师方便，对教学也有好的影响。还有组织教师选书，我在很多大学都工作过，读者服务、老师服务，我们学校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老师图书的订购，信息的交流都做得很好。要加强的一个就是提高借阅率，使馆内图书真正地发挥作用。特别是我们学校是以工科为主的学校，更需要举办一些讲座来宣扬一下文化的气息、加强文史类的知识，增加文科方面素养的内涵。我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现这个问题，英语能力很强，可是汉语基础不好。有些老师在翻译文章的时候，不是不会翻译而是没有美感。就连是理科方面的老师也要加强他们的课堂表达能力。人文是任何学科的基础，现代语言学是所有学科中最领先的学科。但是现在强调一个“通才”的概念，就是理科和文科，都不能偏，理科是对文科一个逻辑方面的辅助。我的基础数理知识不强，给我带来诸多麻烦，现代语言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比如计算语言等没办法读，是领先科学受限制，有诸多研究，是借助数理逻辑知识的。

刘江龙：您爱打乒乓球，打得也很好，在民院得过冠军。您从小学就开始打是爱好？你感觉有什么益处？

耿志：打乒乓球，是我父母培养我的兴趣。最初还不是出于锻炼身体，而是当时家庭成份不好，父母都是“右派”，父母就想了，如果打球打得好一些，对以后学习工作生活将产生积极影响。打乒乓球，我觉得一个是体育锻炼，对身体素质的提高，也是提高交往面。在打球时，认识很多人，我们因球相识、相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不就是通过打乒乓球认识的吗？同时还可以培养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耿志教授简介

耿志，男，1963年1月生于湖南长沙，1984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现任大连民族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大连民族学院文化与翻译研究所所长，湖南科技学院外语系客座教授，美国《圣经文学研究》(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特约主译，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主要涉及翻译理论，英汉语对比和中西文化。长期担任英语专业本科的翻译、写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以及大学英语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各个层次教学。数次评为优秀教师。

出版著作13部；发表学术论文18篇；发表译著5部。曾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院级科研项目10项。其中获得湖南农业大学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获湖南农业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2项；荣获辽宁中外文学交流一等奖1项；获大连民族学院2005—2006学年第二学期课堂教学质量优秀奖1项。

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

4.开明出版第一人——章锡琛

章锡琛（1889—1969），我国近代著名的出版家，开明书店创始人。他早年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主编《妇女杂志》。1926年在朋友们的支持下创办开明书店，并使开明书店成长为我国解放前的六大书店之一。建国后，他先后担任出版总署调查研究处长、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章锡琛毕生从事出版事业，他为人正直，工作稳健踏实，兼具出版家、企业家的眼光与魄力。开明书店从创办到20世纪50年代初和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中国青年出版社，期间共出版了1500多种图书、百余种教科书和10多种期刊。开明书店以其微薄的资金、精干的队伍和勤俭的工作所形成的“开明风”一直在出版界和文化界广受称道。

5.教育出版家——叶圣陶

叶圣陶（1894—1988），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作家、社会活动家、编辑、出版家。“头衔”如此之多，成就如此之大，可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但他自己却总是说：“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职业，我就告诉他，我当过教员，当过编辑，当编辑的年月比当教员多得多。”其实，如果从学生时代编油印刊物算起的话，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时间长达70多年。编辑出版生涯如此之长，这在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他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是中国进步出版事业的先驱，也是新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严谨的编创作风和不倦的奉献精神，更是为我国出版界树立了楷模。

（未完待续……）

大连民族学院图书情报委员会 主办

主 编：包和平

副主编：刘江龙 王学艳

编辑部主任：郭 军 陈新颜

编辑部：王 波 闫海新 沈鹏远 宛文红

金英玉 金 玲 张敬荣 郑巧红

本期责任编辑：金 玲 金英玉

地址：图书馆

电话：87656275 87656290

邮编：116600

电子邮件：shuping@dlnu.edu.cn

（内部使用 发送校内各部门）